溥仪日记

全本（上）

爱新觉罗·溥仪 遗稿

李淑贤 提供

王庆祥 整理注释

天津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溥仪日记全本（上）

爱新觉罗·溥仪 遗稿

李淑贤 提供

王庆祥 整理注释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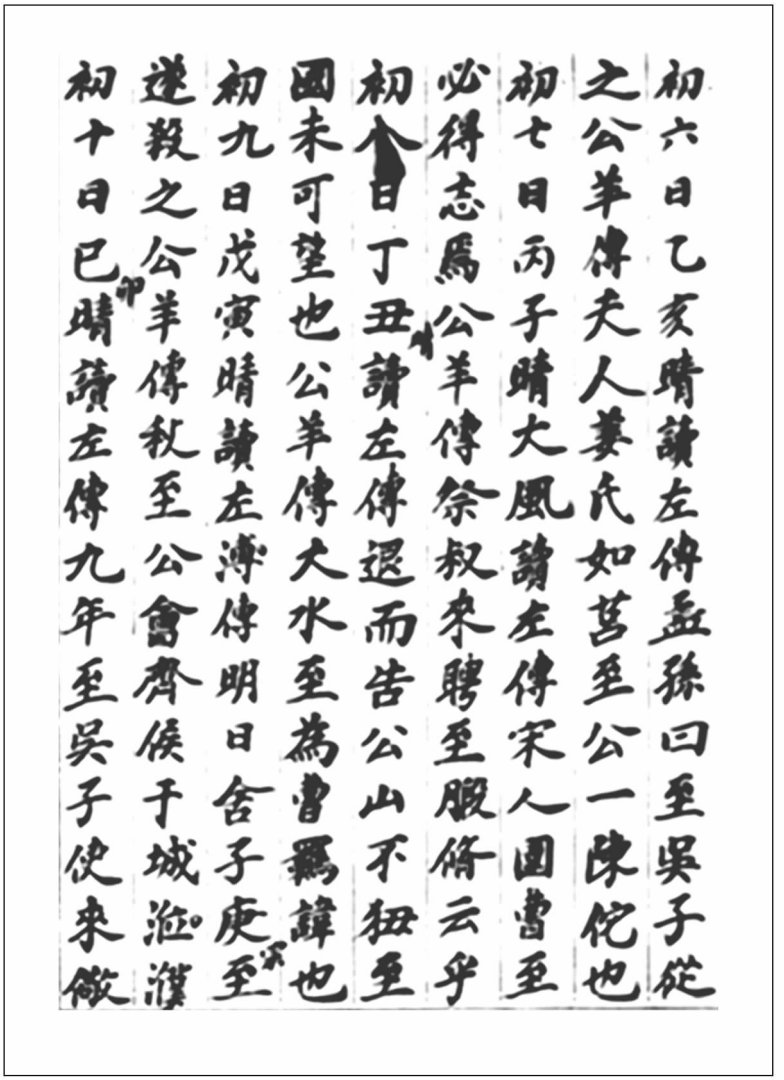
溥仪日记：全本/（清）爱新觉罗·溥仪著；李淑贤供稿；王庆祥整理注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7
ISBN 978-7-201-02465-3

Ⅰ. ①溥… Ⅱ. ①爱… ②李…③王… Ⅲ. ①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日记
Ⅳ. ①K82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58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49 印张　4 插页
字数：750 千字　印数：1-3,500
定价：99.00 元
（上、下册）


初六日乙亥晴讀左傳孟孫曰至吳子從之公羊傳夫人姜氏如莒至公一陳佗也初七日丙子晴大風讀左傳宋人圍曹至必得志焉公羊傳叅叔來聘至服脩云乎初八日丁丑讀左傳遲而告公山不狃至國未可望也公羊傳大水至為曹羈諱也初九日戊寅晴讀左溥傳明日舍子庚至遂殺之公羊傳秋至公會齊侯于城淈濮初十日己卯晴讀左傳九年至吳子使來徵

新版序言

邴　正

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是从皇帝向公民转变的一生。更本质地说,也就是从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生,是从卖国者向爱国者转变的一生。这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历史性的转变,周恩来称之为“世界上的奇迹”,确实很了不起。

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促成了溥仪的转变。改造溥仪,改造旧社会遗留的一切战争罪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在1950年初访苏时最早提出引渡战犯的问题,引渡他们不是为了施以肉体的消灭,而是要给予思想的改造,使之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1956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他听说溥仪在关押改造期间思想进步了就很高兴,曾亲自向载涛当面建议,让他到抚顺去探望溥仪。1959年9月,是毛泽东首次提出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特赦确已改恶从善的溥仪等战争罪犯以及其他各种罪犯的动议。溥仪获得特赦后,毛泽东仍然关心他,把他的转变与进步介绍给许多外宾,还曾设家宴招待他,跟他道家常。

周恩来在溥仪改造的问题上也作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多次找他谈话,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设家宴招待爱新觉罗家族,关心他的健康状况、婚姻家庭和日常生活,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注意保护了他,而在他患病期间更亲自过问治疗事宜。正是这无比真诚的关怀和教育感动了溥仪,促成了他思想的转变。

溥仪特赦前后正在北京市主持工作的彭真,进而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交派的有关事项,1956年2月亲自过问并具体安排了载涛以及韫颖和韫馨前往抚顺探亲的行程。政府给予溥仪人道主义的亲情温暖,对他触动很大。嗣后,在全国政协二届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战犯、战俘的处理问题,其间彭真批阅了一些涉及溥仪处理问题的文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年四川有位名人叫作周孝怀的,举出溥仪在历史上曾经捐款赈灾等事例替溥仪说情。其实,溥仪前半生的历史,是一部热衷于复辟清朝皇权并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傀儡的历史,然而对历史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家都知道《我的前半生》那本书,溥仪在抚顺时就写完了初稿,把人放出来不久,那本书的征求意见稿也印出来了。毛泽东、周恩来看过以后都提了意见,认为检讨太多。彭真也看了那部稿子,同样不赞成把回忆录写成长篇检讨。作为当过皇帝的人能够真诚接受改造就很了不起了,大可不必写一段史实就跟着一大篇检讨。彭真还说过:"当宣统皇帝的时候还是个娃娃,住托儿所的年龄,有什么罪呀!列宁说过,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何况是个娃娃,就说那时糊里糊涂地当上了皇帝就算了,后来又到东北当伪满皇帝才有问题……"溥仪接受了毛泽东等我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意见并认真修改,到后来正式出版时稿子就很不错了。

溥仪当了公民以后先在北京植物园劳动一年,表现很好。彭真打电话了解过他的情况,也让人去调查过,他有自豪感,因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不久,他就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了,他对党感激的心情很真诚,做事情能依靠组织,在生活待遇方面也比较克己。

溥仪患病后,周恩来非常惦念,曾多次召集名医抢救,却还是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如果溥仪能多活些年,看到我们伟大国家的崭新面貌,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能够成功地改造了一位皇帝,改造了一个阶级,而且同样能够改造旧的山河和旧的时代,体现在他身上的那些历史性转变一定更加可观。

天津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版《溥仪日记》(全本),集中了爱新觉罗·溥仪现存一生的日记,包括溥仪在北京紫禁城内当"关门皇帝"时期的日记、在天津张园和静园当"寓公"时期的日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时期的日记,特别是溥仪获得特赦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写于1959年至1967年期间的日记,这一时段的日记内容极为丰富,真实记录了这位末代皇帝在北京植物园、在全国政协、在全国各地参观、在"文革"中、在病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状况,记录了他参与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记录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许多首长对他的关怀和教育,尤其是特别详尽记载了敬爱的周总理对他做过的大量具体工作,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风貌、道德和人品,而溥仪

一生除伪满时期的日记已经被他自行焚毁外,其余各历史时期的日记均有存世,这些日记真实、充分、生动、可靠地留下了溥仪的生平轨迹和人生转变。

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时说:“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将要出版的这本《溥仪日记》(全本)为周总理的论述提供了最可靠、最丰富的证据和最具体、最生动的说明。溥仪日记整理者的研究和注释,也有助于读者对这本日记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溥仪这位历史人物的认识。

出版《溥仪日记》(全本),就是出版这一“世界奇迹”的真实记录。它能够弘扬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也是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在歌颂老一辈领导人的丰功伟绩方面,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溥仪日记》(全本)的价值就在于向世人讲述了一件事实:从历史弯路上走过来的中国末代皇帝,已经深深爱上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祖国。

王庆祥先生早年毕业于我的母校吉林大学,应是我的老学长。从事溥仪研究凡四十多年,精心搜集整理了大量珍贵史料,呕心沥血,著述等身,为国内研究溥仪的权威。我身为王庆祥先生的同事,深为其钻研精神所感动,是为序。

2008年4月10日

(作者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初版序言

高振清

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曾经是中国的一代“天子”,像我们这些五六十岁的东北人,都做过他的“臣民”;改造后他又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堪称“世界上的奇迹”!所以“溥仪现象”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经王庆祥同志精心整理并注释、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溥仪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这无疑是一大贡献。

爱新觉罗·溥仪,的确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因为他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性质的那段社会历史中,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社会势力的总代表,起到复旧乃至卖国的反动作用。这一面,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已由其本人作了总结,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但是研究他历史性转变的一面,即研究他怎样完成了由“天子”到公民、由卖国主义到爱国主义的转变过程,我认为更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对世界也有意义。《日记》的时间跨度长,始于少年时代,终于谢世之前,内容也系统、全面、真实,可以说反映了他一生的经历。只有深入研究,才能揭示出他完成历史性转变过程的轨迹。

自1979年以来,溥仪研究已逐渐形成为我院的科研优势项目之一,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庆祥在这方面“投入”甚多,称得起“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投入多,产出亦丰。他所著《溥仪的后半生》是研究溥仪历史性转变的开拓之作,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叙述并评价了溥仪新生的历史。该书出版后即被列入“1989年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他撰写的《伪帝宫内幕》和《伴驾生涯》等书,也为史学界提供了新的资料。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爱新觉罗·溥仪画传》,在海内外发行后受到好评,香港《大公报》评论说:“画传搜集了溥仪‘从皇帝到公民’一生的重要史料图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在出版的《日记》将是关于

溥仪生平的一部最重要的资料,也请容我在此预支一笔:“必将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

我为溥仪研究这一科研项目的每一成果而感到欢欣,衷心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更扎实、更深入地开展下去。我认为溥仪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更有其政治意义。溥仪所以能够实现历史的转变,固然有其内在的因素,更有外部条件作用的结果,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所以,我们通过溥仪研究,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统战政策,这对于推进新时期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王庆祥同志已经拟定了有关开展溥仪研究的系列成果的课题计划,并且继续得到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有力支持,我很欣慰。在此,我向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谢意,并祝愿王庆祥同志在占有资料优势的条件下,不断提高研究的层次,向纵深开拓,写出更有科学价值的、更富影响力的史学专著。

勉为序。

1991 年 3 月 20 日于长春

(作者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爱新觉罗·溥仪的最后遗产

李淑贤

由王庆祥整理并注释的《溥仪日记》即将付梓,此时此刻与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把《溥仪的后半生》的崭新的样书送到我手上时一样,心情很不平静,记忆又把我带回难忘的岁月。那是二十多年前“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狂潮也席卷了溥仪和我当时居住的地方——北京东观音寺小巷内一处长满树木的宁静的院落。一天,有队“红卫兵小将”来敲门,把一张吓人的《通令》硬塞给我们,顶端还有用钢笔标记的“致爱新觉罗·溥仪”字样。溥仪看完《通令》真有点儿蒙头转向,不知进入了何年何月。我还记得《通令》的大致内容:一是“勒令”溥仪立即交出收藏的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拍的照片,因为他是“历史罪人”,不配站在领袖们身边;二是“勒令”交出正在使用的小汽车等“奢侈品”。溥仪看完《通令》,立即从镜框中取下他在1962年初受到毛泽东接见时两人并肩站立的合影,平时溥仪特珍视这张照片,一直摆在床头茶几上。溥仪还把自己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取下,一起上缴全国政协。他本想依靠组织保住珍贵的纪念品,不料后来发还收去的物品时,毛泽东与溥仪那张最有意义的合影却下落不明了。至于“奢侈品”,溥仪也曾冥思苦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他当时还没有资格享受专用小汽车,想来想去总算找到一样“奢侈品”,那就是摆在客厅里的公费电话。溥仪马上通知全国政协机关,让派人拆除这部特别为他安装的电话。然而,当时的政协机关负责人没有接受溥仪的要求,对他说:“这事儿您就甭管了!请相信我们能处理好。”这部电话不仅出于照顾,确有特殊需要。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过去,溥仪又决定烧书。我家曾向政协机关借了几个书架,有的立在客厅,有的放在卧室,全都摆满了书,大部分是溥仪特赦后陆续购置的,也有一些是机关发的、别人送的。溥仪说,文化革命嘛,这些书都不用留了,说着,就动手一本本撕开来,又跟我两人一筐筐抬到房后小院内,找个僻静的角落点火焚烧。书籍烧得差不多了,溥仪又让我帮他把一大

筐书法作品也拎出来烧掉。那几年常有国内外的朋友向他索字,他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差不多有求必应,而且总是认真给人家写,如有哪个字稍不满意就废弃不用,随手丢在一个竹藤编制的箩筐里。平时没事的时候,他自己也喜欢练字,常常一连写出好多大大小小的条幅来,等墨迹一干便通通丢进箩筐去了。天长日久,挺大的一只箩筐竟装满了一卷卷溥仪亲笔书法作品,结果都在那个令人痛惜的日子里化为灰烬了。

事情尚未结束,更让人揪心的是,溥仪又要烧他的笔记本、日记本、诗文册一类的东西了。也许当时在他看来,用火一烧这就算"革命"了吧?他无法预料会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一烧似可安然。太可惜了!他仍是一页一页地自己撕下来,让我一页一页地填进火堆!先烧掉了诗文稿本,其中有一个小册子我很熟悉,那是1964年春夏之际我们在江南参观游览的时候,溥仪触景生情随手写下的诗文,写到兴奋时,还念一两首诗给我听,回想那时我的亲人真快活,真幸福,与火堆前的丈夫比,心境又何等不同啊!当溥仪继续烧那些日记和笔记的时候,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日记里记的不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吗?我怎么能忘记那些愉快的周末,怎么能忘记那些花好月圆的良宵,又怎么能忘记发生在客厅、卧室和这座长满树木的院落内那些温馨的往事呢?我忽然想出一个对付丈夫的办法,我说:"老溥啊,我听着好像有人叫大门,我在这儿烧,你去看看吧!"溥仪是个特认真的人,加上当时有几分紧张,便马上悄悄走向大门。后来他告诉我,先在里边听听没动静,又开门不见人,遂出去到街口观望一阵。我所需要的正是这一段时间,我从火堆前抢救出十几本日记和笔记。当时我这样做并非已经认识到这些溥仪亲笔资料的价值,只是想留作念物,留下美好的记忆。那天溥仪望门回来还埋怨我"活见鬼",可我心里真高兴呀!现在看来,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越过"十年浩劫"中令人难忍的日日夜夜,我终于把那批溥仪亲笔日记保存到"四人帮"覆灭、人民胜利的那一天。1979年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人员王庆祥同志来京找我,要求与我合作共同整理溥仪手稿资料,我同意了。我能把丈夫的部分日记、笔记、会议记录、学习体会、思想总结、发言草稿、书信、照片以及接待外宾的谈话记录等亲笔资料保存至今绝非易事,这批资料是中国末代皇帝的最后遗产,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专制代表最后被历史埋葬的实证,其政治意义和史料价值难以估量。

1989年12月2日于北京

爱新觉罗·溥仪的遗稿与日记

王庆祥

爱新觉罗·溥仪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新闻人物和国际人物,有着十分独特的经历,而且极富传奇性与戏剧性。因此,溥仪的生平成为中外许多历史学者的研究课题,成为文学艺术家久写不衰、久演不厌的主题,也是广大读者想知道的类似“传奇”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溥仪本人也参与了对自己的历史的研究,他那部在全世界受到重视的《我的前半生》,便叙述和检讨了自己作为大清国灭亡前三年的娃娃皇帝、紫禁城里关门皇帝以及后来成为侵略者工具的傀儡皇帝的历史。

溥仪一生勤于日记,在漫长的前半生岁月里就曾写下无数的日记篇章。可惜大都未能越过历史的变迁,仅天津和伪满两个时期的日记就装满了整整一皮箱,后来伪满垮台了,溥仪率皇族逃到通化大栗子沟,为了毁灭罪证,而把一皮箱日记烧个精光。幸运的是,仍有少量溥仪特赦以前的日记留存下来,包括溥仪留居北京紫禁城时期写的反映宫廷读书生活的日记、溥仪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时期写的几篇反映政治交往活动的日记和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时期随团赴东北各地参观访问时留下的记录。尽管这些日记篇章只是断简残篇、一鳞半爪,却也能够收到“管中窥豹”之效。

对于特赦以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的新生活,溥仪生前多次讲过,他不打算再用笔续写一部《我的后半生》,只想留下实际行动。他确实用行动写完了这本《后半生》,同时执笔记录了行动,这记录便是一批并非为了刊布的手稿。它们是溥仪在全新历史条件下的直感直叙,是毫无修饰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更具研究价值,也最有资格续补那部《我的前半生》。

溥仪的这批手稿包括两大类:一是日记,现存十一册;二是文稿,存有文章、总结、感想、讲话稿或谈话记录等数十篇。其核心部分是日记。

溥仪这一时期的日记始于特赦之初,终于去世之前,按时间顺序囊括了后半生的历程,具有系统性;日记内容广泛,包含了溥仪这一人生阶段的学习、工作、劳动、家族、家庭、婚姻、生活、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完整性;日记主人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因而能更多地反映真实思想,具有真实性;日记从每天的具体活动入笔,详则记录情节、对话,略亦按日系事,又具有细致、生动的特点。

日记以溥仪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为内容,不但表现了他在政治观点、思想方法和生活态度等大问题上脱胎换骨的转变,而且表现了他在思想意识、情操和品格等方面弃旧图新的努力。它以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溥仪的转变。溥仪本人曾在一些会议上,在与抚顺战犯管理所来访人员的谈话中自我总结接受改造、思想转变的过程,被他称之为"认罪"、"服罪"和"悔罪"的几个阶段,也就是从强迫改造到不自觉改造,再到自觉改造的前进中不断攀登的几重思想台阶。

对于一位皇帝的亘古未有的成功改造,世界上许多著名人士感到惊奇,读过这部日记就完全能够理解了。从客观上讲,决定的因素是历史趋势。溥仪深深懂得:时代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他曾经那样热衷并孜孜以求的封建复辟之路早已堵死,社会主义前途是当代中国的唯一选择,他本人也必须转变思想才有出路。从日记里看得出:溥仪对社会的冷静观察。切身感受使他认识到,晚清帝国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都是腐败的、卖国的,没有人承认的伪满政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和工具。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好。他真诚热爱晚年才碰上的新国家。从主观上讲,当然可以说溥仪有报恩思想。他总觉得自己"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但人民政府对他不杀头,还给予特赦、安排工作,帮助他在政治上进步,照顾他的健康和生活,关心他的婚姻、家庭和家族,并在政治和社会风暴来临的时候对他加以保护,等等。如果说溥仪那种朴素的报恩思想产生于抚顺改造的年代,那么,应该说特赦以后他的思想境界已经明显提高了层次,我们能够看到他载于日记的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思想、言论和行动。

溥仪的改造,他的思想转变,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这也是众多人们关心的问题。根据日记提供的"答案",我们看到溥仪在公民身份、选举权、工作、学习、劳动、衣、食、住、行、交往、治疗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都与平民百姓无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那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感,是很真实的。这一切都说明溥仪在思想、作风和习惯的大节方面已经得到

彻底的改造,有了重大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世界上的奇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的方面和一切问题上都跟普通人毫无二致,从他身上还时而能流露出某种可以称作“皇帝意识”的东西:他总怕别人指其“特殊”,实际正是自己感觉上的特殊;他连许多最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懂,如该讲礼貌的时候往往“唯我独尊”,而不该谦让的时候又常常“彬彬有礼”,此类实与普通百姓不能相比;某些完全应该自理的日常活动,他虽然很想一一做好,却又难以事事遂愿,如在公共场合就餐不带饭碗,有时入厕忘带手纸,如此等等,只能证明这位人士绝非“凡夫俗子”。然而人们都能理解,谁也不会在这类问题上苛求一个当了几十年“皇帝”的人。事实上,由于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的种种原因,认为溥仪这位当年的皇帝可以变得和今天的公民完全一样,甚至连习惯、禀性等思想范畴以外的生理性因素也变得像个普通老百姓,那是绝对不现实的,完全不可能的。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读过日记的细心读者能够体会到,溥仪直到生命的垂危阶段,身上还有淡淡的“皇帝味”,这恰恰能够说明他的改造是成功的,十分真实,特别可贵。

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溥仪特赦以后的日记为有兴趣的学者和读者,从哲学和心理学的高度深入研究溥仪的改造与思想转变,提供了最直接、最生动的资料。

日记中,溥仪还以关心时局的普通人的身份,记述了当时一些重要的国内、国际上的政治事件;更从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特赦人员的角度,记述了作为同事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情况和一些历史事实。由溥仪笔录的个人与家事以外的内容,也都具有重要价值。

溥仪在日记中主要是记下了个人经历,但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政策和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对于改造一切现存的敌对分子和犯罪分子,对于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启迪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和平统一祖国,对于团结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和华人,进一步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十分深远和非常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明的是,溥仪特赦后所写的日记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根据溥仪亲笔编号,他在八年中一共写了二十八本日记,而且实际上比这还要多。因为我发现还有一些零散的日记被随便写在各种各样的笔记本子上,没能列入编号的日记系统中。据李淑贤说,很多日记是溥仪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行焚毁的,也有一些日记和文稿是溥仪去世后陆续失掉的。在让人痛心

而又令人难忘的年代里，李淑贤居无定所，辗转迁徙，从偌大的院落厅堂之间陡然迁居到狭小厢房内，实在无力保存原有的许多家什物品。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她几度搬家都不得不忍痛缩减保存丈夫纪念品的数量，这一事实又令人遗憾地造成了溥仪生平中的诸多空白。

现将存留的溥仪特赦以后的日记作一概括介绍：

第一册，精装封面上有“北京日记”字样，32开本，扉页上印有天安门照片。首页即1959年12月14日日记，题为“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讲话”。溥仪还把1960年至1963年间的外事活动集中在这个本子上了。本册中尚存有溥仪在1960年写下的其他文字，如“1960年11月自我鉴定”、“植物园工作手册摘录”、“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摘录”等。本册无溥仪自题的编号标记。

第二册，是一本带记事格的《1963年农历》，32开本，每月只占两页篇幅，溥仪1963年全年的日记就写在这本《农历》的记事格内。本册无溥仪自题的编号标记。

第三册，是外文出版局日文期刊《人民中国》赠送的纪念册，比32开本稍小，每页左上角都有“人民中国”刊头标记。溥仪从1964年3月11日至4月29日在江南六省一市参观游览的日记都写在这个本子上，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部分为参观游览行程简记，后部分为现场记录及座谈感想方面的文字。本册无溥仪自题的编号标记。

第四册，为64开普通平装小日记本。前半部分是别人的笔迹，原样抄录了1964年3月11日至4月29日溥仪在江南六省一市参观游览的日记，并附有一篇以李淑贤口气写的参观江南感想；后半部分是溥仪亲笔所写，开头有“1964年第二次参观”字样，接着是1964年8月5日至8日在西安参观的日记，最后是一篇参观西北的感想稿。这篇文字的笔迹是溥仪的，但口气是李淑贤的。本册日记或专为李淑贤准备，李因病未去延安。故日记中亦无参观延安的内容。在溥仪参观西北的日记已经失掉的情况下，本册保存了四篇从溥仪日记原文抄录过来的日记，格外珍贵。本册无溥仪自题的编号标记。

第五册，是32开的插有许多学习雷锋图片的日记册，溥仪用它作为1965年的工作杂记本。内载“北洋组1965年5月至12月工作计划(草案)”以及溥仪抄录的周恩来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讲话、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的学习动员报告等等。其中有三篇属于日记范畴，时间明确，分别为1965年

3月17日、4月14日和4月20日所记,按内容可称之为思想日记。本册无溥仪自题的编号标记。

第六册,为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发行、陶然亭文化纸品厂于1964年11月印制的100页装64开日记芯式小本子。全册正反面都记满了文字。溥仪在扉页上亲笔自题了"日记本,二十三本,从1965年4月15日起到8月22日止"字样,是溥仪正式编号的第23册日记。

第七册,为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发行、北京市印刷公司于1965年6月由龙门印装的80页笔记本,其规格小于32开,大于64开。全册正反面都记满了文字。日记起于1965年8月23日,迄于同年11月3日。溥仪在扉页上亲笔自题了"日记本,第二十四本"字样,是溥仪正式编号的第24册日记。

第八册,为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发行、宣武区社会福利工厂于1965年6月印制的100页装50开平装日记本。全册正反面都记满了文字。日记起于1965年11月4日,迄于1966年4月30日。溥仪在扉页上亲笔自题了"日记本,第二十五本"字样,是溥仪正式编号的第25册日记。

第九册,为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发行、北京市日历厂于1966年4月印制的80页装50开平装工作日记本。全册正反面都记满了文字。溥仪在该册封面上画了一颗五角红星和一面飘扬的小红旗,还亲笔从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抄录出三段语录,并在封面原有的"工作日记"四个字下题写了"27册"字样。底部还有一行钢笔字迹:"1966年9月1日开始,到1967年2月16日。"在扉页的正反两面上,溥仪还使用当年的流行语句,题写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一类政治口号,留下时代的印痕,此即溥仪正式编号的第27册日记。

第十册,为北京文化用品公司发行、宣武区社会福利工厂于1966年11月印制的80页装149×100毫米开本的工作日记本。全册正反面都记满了文字。日记起于1967年2月17日,迄于同年8月31日,是溥仪正式编号的第28册日记。

第十一册,为小于64开的普通平装小日记本,实际是未加塑料皮的本芯。在白色封面上有溥仪亲笔题写的"病中纪事"字样。日记起于1967年9月6日,迄于同年10月12日,这最后一天日记,即溥仪绝笔。小本子上还有溥仪在逝世前十一天——10月6日写给妻子的字条等内容。本册无溥仪自题的编号标记。

本书以上述十一册日记为主,兼收溥仪特赦前各个时期的日记存篇,本

着实事求是、忠于原文、保存史料的原则，按时间顺序编排。

关于本书的整理，首先应当指出，溥仪日记中记录的某些讲话、记述的某些见闻，以及其中反映的某些观点，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特殊环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这当然不应苛求于写日记的人。对此，除删除一些内容外，均加注释说明。如加注引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段落加以说明。尽管如此，当年的日记不能不带有当年的痕迹，“而且作为个人的日记，受到经历、感情及特定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在记人记事方面也难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看问题的片面与偏见”，谨请研究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历史背景正确对待之。

关于本书的整理，还应说明的是，溥仪日记中的某些记载过于简略，以致内容不能明了，对此而有其他可靠资料能够补充或佐证的，都尽可能注出或作为“篇后附录”而完整引证出来，似有助于环境的补充。本书“篇后附录”较多地利用了董益三先生的日记资料。董先生是溥仪特赦后的同事，他们都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同室办公，朝夕相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五年多时间里，他们不但有共同的业务生活、政治学习生活、劳动生活和参观旅游生活，两人还成为邻居和相知的朋友，发生了比其他专员间更密切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年代里，董先生帮助溥仪分析形势、正确处理面对的各种难题，使两人的情谊在新的考验中得到深化和发展。当本书注释者在80年代初走访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时，他热情而直率地提供了自己的日记(1962年~1967年)以及当年的工作笔记等珍贵手稿资料。董先生的生活规律性极强，日记准确、详明、生动、具体，富有思想性和史料性。他提供的资料不仅能够核实溥仪日记中的许多记载，而且有助于丰富溥仪日记的内容，使其失于简略的涉及专员共同生活的记述，得到了必要的补充性的具体说明。尤为难得的是，董先生日记中还有数量不少的关于溥仪言行的生动的直接记述。引证董先生的日记、工作笔记作为“篇后附录”和注文，等于保存了一批有关溥仪思想和生活轨迹的重要佐证资料，填补了溥仪遗留的部分空白。

关于本书的整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溥仪当年执笔记事，并不曾想过发表或出版，对于语法、修辞、行款等都很随便，字迹难辨，连日记页面也显得杂乱。然而，一切必要的整理都以尊重原文为前提。例如有些地方文字不够通顺，但尚能明白其意，则保持原貌。有些字模糊不清，无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